

# 埃及学文集

刘文鹏



.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刘文鹏在埃及吉萨金字塔前留影

### 作者简介：

刘文鹏，男，1931年12月生于大连市。1953年毕业于师大历史系毕业，1955年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69年调下乡插队落户。1972年4月调入吉林省通化市，1980年调为内蒙古民族学院。1980年任政史系主任，1983年任副院长。1984年被美国肯尼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9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10月学院成立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至今任所长、教授。1975年以来至今先后担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近十余年发表的有关埃及学的论（译）著50余篇，百余万字。

# 走向法老的王国

## ——代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漫长的人生，各有其不同的追求和选择。而我这一生既没能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又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在商海浪潮翻滚的新时代下海闯荡，显示一下适应时代潮流的人生价值。即便是在那似乎令人尊崇的高等学府的“官”场上，虽说我干了一阵子，将近10年的时间也许不算短，可是一直到退位时，看来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弄明白，更不要说给自己捞点什么油水。

我从1955年下半年参加工作以来，至今恰好是满40个年头了。40年来，我坚持的是治学授课的行当，一条道路走到底，始终没有离开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特别是近20年，我的研究工作范围逐渐缩小，最终选定了一条通向“法老王国”的埃及学之路。这是一条神秘而陌生之路，更是亟待开发的一条充满艰辛而曲折之路。回首往事，40年的生涯总算没有白白渡过。如今，我从已经发表过的数十篇(部)的论著中，选择了部分论文编辑了一部《埃及学文集》，我把它奉献出来，是希望为我国埃及学的建设和发展奠上一块砖，同时也是向我的导师交上一份早就应该呈献的答卷。虽然这块不显眼的小砖，或许令人不屑一顾，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存在与我的生命同等的重要。我珍惜它，热爱它，因为它不仅仅是我走向“法老王国”足迹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它沁透了党哺育我们成长的乳汁和老一代专家导师谆谆教导我们而洒下的血汗。

1950年，我只身离开了我那可爱的家乡大连，来到了东北师大，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大学生。面对着一片博大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如饥似渴，象婴儿吸吮母汁那样，竭尽全力，贪婪地吸取

一切知识。有幸的是好多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老师亲自为我们讲课授业，特别是那如今还笔勤在位的林志纯教授。他那丰富、精深而新颖的教学内容，尤其是他的严格而认真的教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亲身体验，在我以后的研究生学习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林志纯教授为导师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继续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导师为我选择了近东古代史(西亚、埃及)作为研究方向。我查阅了俄文、日文的有关文献，开始接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楔形文字的书板材料，美妙神奇的埃及象形文字，还有那些德文版的埃及语大辞典，英文版的科普特语辞典等大部头的文献与工具书。由于语言文字不通，简直令我无所适从。只好一面讲课，一面硬着头皮攻读外语，翻译文章，以便首先掌握专业研究的工具。我除了继续深造俄语外，在导师的指导下，每周两个晚上登门求学英语，整整学了一学期。后来，我又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还常常下乡下厂下矿劳动锻炼，在矿山与工人下井采煤，在锻工车间抡大锤，一去二、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拉丁语和德语的学习自然也就夭折了。在那个年代，学习专业和外语，不仅没有今天这样的方便条件，而且还要时刻警惕被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师生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建设红色根据地”，长春市的几所大学教职工的大部分下乡插队落户。在1969年严冬，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几趟“专列”开发到吉林省各地，而我们一家包括不满周岁的孩子和另几户师大员工来到延边地区的一个偏僻的林区山沟落户，改造和锻炼了二年半。其中的苦难，被歧视和被压抑的感受自不必说，就连马恩经典著作也跟随着我遭了殃。除了部分书籍当作引柴外，我保留的一部马克思的著作竟被老鼠啃了一半，至今它却成了我的辛酸历史的见证而被珍藏着。

1972年4月,我“荣幸”的第一批被抽调出来,安排在吉林省的通辽师院工作,后来,它又归入内蒙古,改为现今的内蒙古民族师院。我刚到通辽师院时,正是工农兵“上管改”的阶段,工人阶级上讲台,而我的世界古代史只上了几天就被迫停课。我不得不改行,配合“批儒评法”讲授中国史,从古到今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约在1975年,我的导师林志纯教授组织了北大,北师大等6所院校的同行开始编写《世界上古史纲》。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断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在需要重新开始,限于研究工作条件,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集中到长春,后来又到北京集体编写或修改。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全力以赴钻研埃及学:阅读国外新近出版的专著,特别是有关杂志;同时编写《古代埃及》部分的书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党和政府为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条件。1979年《世界上古史纲》出版后,收到了很大的反响。虽然其中的《埃及史》一章我写了近8万字,但仍感到好多问题没有写完,没有写透,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使下,我决心在埃及学的这块狭小的,被人忽视的园地上继续开拓、耕耘下去。

埃及学,从1822年诞生至今将近两个世纪之久。但是,我国的埃及学也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起步的,至今国内的研究者寥寥无几。这与我们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历史和现状很不相称的。中国与埃及都是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国家,相互之间的交往早已开始。我国宋代学者撰写的《诸蕃志》,记载了作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埃及亚历山大灯塔。在保留至今的唐明时期修建的泉州开元寺,在其大雄宝殿前台东腰石上的狮身人头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埃及斯芬克斯的踪迹。在我们内蒙古的巴林右旗的庆州辽代白塔上,我们看到的人头鸟身的所谓“金翅鸟”,使我想到了埃及的精灵“巴”的形象。埃及的古老文明不仅

是埃及人民的，也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需要了解埃及的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研究埃及学，不仅需要掌握古代埃及的历史，还需要借助于考古学、文字语言学、艺术和宗教等学科。所以，除了历史著作外，我不得不接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艺术甚至建筑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发掘报告等。但是，在我们这样一所没有任何实力的普通师范学院，又有多少资金能够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呢？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没有一本我所需要的专业外文书刊。最初我不得不东奔西跑，借阅兄弟院校和北京的一些图书馆的外文书刊，或者摘要抄写，直到闭馆为止。但是，返回学院撰写论著时，因为书刊的缺乏，或者资料核对的困难而往往难以断笔；生活条件的艰苦又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工作。我们一家居住于没有水暖设备的简陋的小平房，冬季就象置身于四面通风的仓房中，看书写字不得不趴在炕沿上，以期沾点暖气，免得冻僵了手指握不住笔。

人生在世，不仅面临多种道路的选择，而且还要把握不同命运的机遇。我从长春下放到山沟，又从山沟来到通辽，思想上的波动很大。我曾多次要求调转工作，长春、大连等地的一些院校也曾来函商调，但是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变命运的机遇，因而在内蒙古的这座塞外小城扎下了根。如今已经渡过了 20 多个年头了。但是，我始终不想作命运的奴隶，因为我与“奴隶”打了多少年的交道，深知奴隶的命运是太可怕了。在工作和生活极其简陋困难的条件下，我挣扎奋斗，追求事业上的发展。尽管我的条件差，起点低，但我并不气馁。我孜孜不懈地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下去。

1978 年，我们一家搬进了楼房，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83 年，我担任了学院的行政领导工作。1985 年，我的埃及学研究得到了自治区教育厅的重视，被列为全区的重点学科，从

此每年得到了经费上的资助和保证。这使我有可能会订阅昂贵的外文书刊,或者复印有关的重要资料。1991年,经教育厅的批准,我们成立了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从80年以来的10几年间,我参加了“六五”、“七五”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重点项目的合作研究。我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经济学》、《外国历史》各卷中有关古代埃及的考古、经济史和历史方面的辞条项目的撰写工作。此外,我在国内的一些刊物和我院学报上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我的埃及学研究的生涯中,最令人激动的是,1988年我应邀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埃及学的国际大会的舞台上。尽管我个人的学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甚大,但是我提交的《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的论文在大会上交流;会议期间还结识了一些外国同行专家,有的朋友至今还保持书信来往。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机会到埃及各地自行参观考察了博物馆和重要的古迹古物。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在访问了埃及之后感慨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的确巍峨壮观的金字塔,宏伟瑰丽的卡纳克神庙,高耸入云的方尖碑,神秘莫测的帝王谷,荒野矗立的美农巨象,以及散在各地的斯芬克斯等让人处处感受到五千年伟大而古老文明的业绩和魅力。特别是那条贯穿埃及南北的尼罗河,常常引起人们思古的遐想。我每到一地,总是要漫步在各段身姿不同的尼罗河畔,凝视着她那千万年来川流不息的生命之源。古典作家赫卡泰俄斯和希罗多德的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赐”,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另外,我还想提到的是1991年意大利都灵市举行的第6届国际埃及学大会。尽管我已作好了出席大会的准备,终因国内的种种阻力而未去成。但令人得到安慰的是,我事先提交的一篇评述法老专制主义的论文被收入大会论文集中,1993年正式在意大利出

版。

但是，我不能隐讳的是，从1983年起将近10年的期间，我的行政工作与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我以治学授课为已任，安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从未想象到担任学院的行政领导工作。然而，对于组织的任命，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得不在努力完成行政工作的同时，坚持教学与研究。在行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研究工作几乎难以坚持下去；论证问题的思路也常常被打断，我也只好平时摘录或积累点资料，到寒假和暑假时可以“合成”几篇文章。尤其是令我烦恼不安的是，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我既不想依托什么人，也不想笼络某些人。我在行政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至今也不知道主管我们干部的组织部的大门朝哪开；对于人们的吃喝请客也常常推辞，让人看起来好象不识“抬举”。为人处世，自以为坚持原则，反而遭到某些冷遇。这样的干部又怎能适应当今的“潮流”？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误人误己。如今我已年逾60，自然是被罢了“官”，有幸的是允许我延长了几年，继续搞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目前，除了授课任务外，我承担的中华基金社科研究项目——《古代埃及史》的写作任务即将完成。在这几年的写作过程中，我才体验到我给自己担负了一个多么沉重的担子，日日夜夜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尽管这样，我只要走进自己的书房，不论昼夜，在这个只身享用的小天地中，无拘无束地耕耘、探索，自有说不出的情趣，一切烦恼也被抛之九霄云外了。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40周年。不久前，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邀请，访问了埃及。江泽民主席发表书面讲话说：“中国、埃及都是举世闻名古国，两国人民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埃人民连绵不断的友好交往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融合与发展。”古代埃及文明是全人类的一座伟大而珍贵的历史和文化宝库，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还需要我们



共同去开发。中国的埃及学也要发展起来。

“行行重行行”。多年来，虽然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所奉献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在我敲响奥西里斯的大门之前，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愿意在“法老的王国”里探索，在埃及学的这条艰辛而崎岖的小路上继续攀登。

刘文鹏

1996年2月于内蒙古民族师院

# 目 录

走向法老的王国——代序 .....	1—7
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 .....	1
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 .....	21
论埃及文明的起源 .....	36
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 .....	63
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 .....	81
希拉康坡里王朝及其霸权考 .....	98
希拉康坡里画墓及其壁画 .....	123
前王朝至早王朝时代埃及墓葬的发展 .....	141
金字塔建筑的演进与衰落 .....	156
《梅腾墓铭文》所见的古王国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制 .....	175
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 .....	196
“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扭曲 .....	225
底比斯的神庙与王陵 .....	254
古埃及女王哈特舍普苏及其葬祭庙 .....	273
古代埃及的蛇的崇拜与传说 .....	277
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之类比研究 .....	291
附录	
《训诫》的年代在第二中间期 .....	308
埃及“法老村” .....	324
后记 .....	330

# CONTENTS

Go to the Pharaohs' Kingdom — by Way of	
Introduction .....	1—7
Origin, Development and Modern Study of Egyptology .....	1
Chronology and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Egypt .....	21
On the Origin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	36
Early City in Ancient Egypt .....	63
Early State of Ancient Egypt and Its Unity .....	81
On the Dynasty of Hierakonpolis and Its Hegemony .....	98
Decorated Tomb of Hierakonpolis and Its Painting .....	123
Development of Tomb of Ancient Egypt During	
the Predynasty and Early Dynasty Period .....	141
Evolution and Decline of Pyramid .....	156
About Private Land During the Old Kingdom	
Period in "Inscription of Methen" .....	175
Despotism in Pharaohs' Egypt .....	196
Wittfogel's "Hydraulic Despotism" and	
Ancient Egypt .....	225
The Temples and the Tombs in the Thebes .....	254
Queen Hatshepsut and Her Funerary Temple .....	273
On the Worship and Legend of Snake in	
Ancient Egypt .....	277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the Funeral	
System of Ancient Egypt and Ancient China .....	291
Appendix	
A Date for the 'Admonitions'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Translation) .....	308
"Pharaohnic Village" in Egypt .....	324
Postscript .....	330

## 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

古代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从希腊人开始，人们就对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留下了一些旅行访问的记录。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老的文明逐渐被历史的发展所淹没，直到19世纪初，由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埃及文明才重新被揭示出来，并以崭新的姿态展示在现代人的面前。

对于古埃及文明和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则是摆在埃及学面前的任务。什么是埃及学？埃及学是怎样创建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是怎样起步的？这些问题国内的研究涉猎甚少。为了发展我国的埃及学，加强埃及学科的建设，有必要对上述问题作些评述。

### 一、什么是埃及学

所谓埃及学，乃是近代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科：它既包括古埃及的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又有宗教学、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到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和技术史等自然科学各分支。埃及学研究所跨越的年代范围，从尼罗河流域的人类的出现开始，包括所谓史前各文化时期、法老时代，以及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各阶段，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埃及为止，但是，主要是法老文明时代。

古埃及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民族，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埃及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各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遗物，以及各种文献记录为我们研究古埃及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现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逐步地揭示出古埃及社会历史与文化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发展。而构成埃及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埃及文字的发现与译读则是埃及学创立的基础。古埃及文字从前王朝(公元前4500—3100年)后期开始出现,经历了象形文字、僧侣文字、世俗文字和科普特文字几个类型和发展阶段,直到公元四、五世纪,象形文字和世俗文字才最后消失。与此相关的语言的发展,分为古埃及语(1—8王朝)、中埃及语(9—11王朝)、后埃及语(18—24王朝)、世俗语(25王朝到后期罗马)和科普特语(公元3世纪开始)各阶段,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语代替埃及语。

古埃及人由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的实践中,自然科学逐渐发展起来。尼罗河的年年泛滥和先民的灌溉农业生产活动,使他们发明了数学和天文学。人们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命,特别是木乃伊的制作,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古埃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疑地为埃及学研究扩大了范围。

公元前30年以后,古埃及先后被希腊、罗马所征服和统治。古老的埃及文明与晚后发展起来的西方古典文明发生了直接的交往。作为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典学、纸草学等也与埃及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学科的发展必然地为埃及学填补了新的内容。作为以古埃及为主攻方向的埃及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领域内,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成长发展起来。

古埃及地处北非,邻近西亚,自古以来,北非西亚唇齿相连,密切交往,互为影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近东文化圈。因此,埃及学又与研究西亚的亚述学、赫梯学、伊朗学以及南亚的印度学等构成了范围更为广泛的东方学之一部分。

## 二、古代作家和旅行者关于埃及的记述与考察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后,古老的埃及文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希伯来人的经典和古典作家的著作则保留了有关埃及的最早的一些记录。

在《旧约》的《创世记》中，记述了希伯来人约瑟在埃及为相时期，埃及的丰年和灾年，以及政府的囤粮备荒政策。《出埃及记》则描写了希伯来人不堪法老的奴役，其首领摩西率领他们逃离埃及的历史传说。

古典作家最早提到埃及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人海卡泰俄斯。继他之后前去埃及旅行的著名作家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他在《历史》一书第2卷中，专门记录了他到埃及所见所闻的一切，包括王朝的历史、传说、著名的古城古迹，特别是金字塔的建筑，以及多采奇异的神话故事和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希腊作家狄奥多拉斯和地理学家斯特里波出访埃及，对大金字塔、神庙和著名的古城作了记录，并对埃及文字作了介绍。他们对古埃及的文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狄奥多拉斯还记述了埃及的王朝史，特别是波斯人征服埃及及其以后时期的历史事件。

公元一、二世纪以后，罗马作家，如普鲁塔克、阿普里阿斯、亚姆比利库斯等都谈到了埃及的宗教思想，特别是普鲁塔克的《关于伊西丝和奥西里斯》的对话是古埃及宗教神话的最早的论述。在这里，他不仅记述了古埃及历史上最流行的奥西里斯神话，而且还扩大到塞特与荷鲁斯的斗争。这些古老的传说对我们研究古埃及的神话与宗教具有重要价值。罗马作家塔西陀及其晚后的阿米安努斯·玛尔凯努斯在其著作中都谈到了底比斯废墟及其象形文字铭文。由于古罗马人对埃及象形文字铭文的偏爱，在他们征服了埃及以后，至少劫掠了不少于12块方尖碑用来装点自己的城市。

古埃及作家马涅托的著作，在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3世纪，埃及僧侣马涅托用希腊文写作了几部著作，其中《埃及史》一书记载了埃及的30个王朝历史，并把人王的统治追溯到神、英雄和亡灵朝。这部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埃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和某些基本的历史事件。遗憾的是，原著已遗失，

仅仅在犹太史家约瑟福斯的著作中保留了片断。此外，还有一部《埃及史摘要》，它以王名表的形式列举了各王朝诸王的世系年代，并系之以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但是，《摘要》却并非马涅托本人所作，而且又被希腊化时代犹太作家所篡改。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摘要》一书的内容则是在基督教编年史家阿夫利坎努斯（约公元3世纪）和优塞比乌斯（约260—340）等人的著作中保留下来的片断。<sup>①</sup> 公元5世纪后期上埃及人赫拉波罗可能用科普特文写成《象形文字》专论，但残存下来的却是希腊文稿。

上述的古代作家的著作，虽然对我们了解、研究古埃及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生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其中有些记载往往道听途说，缺乏依据，有的甚至虚构，还有错误。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除了模仿、学习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外，对古老的埃及文明也逐渐产生了兴趣。16至17世纪，少数欧洲人旅行到埃及，搜集文物和文字资料。别罗纽斯和乔治·山地斯分别在1553年和1616年考察了大金字塔。皮特罗·戴拉·瓦列旅行到了整个东地中海区，1626年他带着埃及木乃伊和重要的科普特写本返回意大利。博学家阿纳塔西乌斯·基歇尔受托于皮特罗·戴拉·瓦列翻译科普特文稿，并开始研究科普特文，在1636年出版了《科普特语或埃及语的先驱》一书，这部著作不仅标志着科普特语系列著作的开端，而且也作为象形文字的译读给予启示。

除了上述旅行者外，最早进行考古考察工作的，可推英国天文学家约翰·格里夫斯。他在1638—1639年，准确地测量了吉萨金字塔群，并在1646年发表《金字塔学》或《埃及金字塔的发现》一书。更大的进展是在17世纪后半叶，耶稣会的克劳狄·赛卡德受法国领事的派遣，调查埃及古迹。他4次前往上埃及，是第一位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验证底比斯遗址和正确记录美农

<sup>①</sup> Manethos' Hisory of Egypt, London, 1949(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p. 1—187.

巨像与帝王谷的近代旅游者。

在18世纪,前往埃及的旅游者剧增。英国主教理查德·波刻克对达赫舒尔和萨卡拉金字塔群提出了考察报告。他在1743年以及丹麦人F.L.莫尔顿在1755年发表的带有插图的旅行出版物,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埃及的兴趣,扩大了人们对埃及文明的认识。但是,对古埃及进行科学的、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作为科学的埃及学的创立,则是在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后。

### 三、埃及学的诞生与发展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提供了两把钥匙:一是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另一个则是打开了古埃及语言的大门,并由此打开了古埃及历史和文明的知识的大门。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随军组织了东方学、自然科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专家参加的学术团,前往埃及搜集和记录古迹古物。以维范特·德努(1747—1875)为首的学术团完成了埃及全境文物的普查工作,并且详细地记述和准确地描绘了他们发现的一切。根据这些成果编成的关于埃及学的第一部著作,24卷本文字论述和12卷本图录的《埃及记述》在1809—13年间出版。这部著作不仅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被岁月淹没了的令人惊奇的世界,而且其古老的伟大文明唤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拿破仑远征带来的另一重要成果是罗塞达石碑的发现。1799年7月,法国士兵在罗塞达(拉西德)修筑要塞时,发现了一枚破损的,形状不规则的黑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是托勒密王朝时代僧侣对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5—180)的感恩纪念碑。由于碑文是用埃及象形文字、世俗文字和希腊文三种字刻成,因而它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国学者德·萨西(1758—1838)、瑞典外交官阿凯尔布莱德和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格(1773—1829)先后对它进行了初步研究。法国学者J.F.商博良



(1790—1832)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通晓古典语言和某些东方语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译读罗塞达石碑,并参考了其他一些碑文。他从碑文上的王名圈内的王名开始,利用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的拼音对比研究的方法,逐渐译读出几十个王名,并确认了象形文字的12个字母文字,从而掌握了译读象形文字的关键。1822年9月29日,他在法国科学院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语音的字母给M·达西尔的信》,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宣布象形文字译读成功。通常把这一天看成是埃及学的誕生日。此后,商博良与意大利学者罗塞利尼(1800—1843)在1828—29年率考古工作队去埃及考察,搜集古物,临摹建筑物和抄录铭文。他为我们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合作的10卷本的《埃及与努比亚古物》(1832—40),以及他个人的《埃及语法》(1836—41)和《埃及语辞典》(1841—43)等。商博良及其后继者们,列普修斯、布鲁格什、马斯帕洛等人在象形文字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世俗文和僧侣文的研究上都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作为埃及探险和早期发掘者的意大利人G. B. 贝尔佐尼(1778—1823)从1815年开始先后3次去埃及,在底比斯从事神庙、陵墓的考察发掘。他发现了著名的谢提一世墓,通常以“贝尔佐尼陵墓”而闻名于世,还有吉萨的哈夫拉金字塔的入口。1820年出版了他的金字塔、寺庙和陵墓的发现,以及红海沿岸与阿蒙缘洲旅行纪实的著作。他虽然为后来的科学发掘开辟了道路,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典型的盗墓者。他劫掠了大量财富,破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还有一位探险的先驱者,古物收藏家,法国籍的意大利人B·德罗威提(1775—1852)。他以法国驻埃及领事的身份,在埃及各地旅行,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特别是从土著民那里大量收购古物。1824年,他将其收藏品卖给意大利萨丁尼亚王,这些文物后来成为都灵博物馆的埃及收藏品的重要部分。他在埃及的第2次搜集品为法国的查理士十世